

Thomas Robert
Malthus

人口原理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著

杨菊华 杜声红 译/注

Thomas Robert
Malthus

人口原理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著

杨菊华 杜声红 译/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口原理/ (英)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著; 杨菊华, 杜声红译、注.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7

书名原文: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ISBN 978-7-300-25931-4

I. ①人… II. ①托… ②杨… ③杜… III. ①人口学 IV. ①C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3737 号

人口原理

[英]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著
杨菊华 杜声红 译/注

Renkou Yuanl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2.75 插页 3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86 000	定 价	48.00 元

译者序

今年是《人口原理》出版 220 周年，谨以此书向其作者马尔萨斯致敬！

一、马尔萨斯的生平简介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1766 年 2 月生于伦敦附近的萨里郡，其父丹尼尔·马尔萨斯 (Daniel Malthus, 1730—1800) 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一位思想激进的绅士，与大卫·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 关系密切，并与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等人有过交往。马尔萨斯从小在家中接受教育，最初由其父亲亲自教导，后来师从格雷夫斯 (Richard Graves, 1715—1804)、韦克菲尔德 (Gilbert Wakefield, 1756—1801) 等人。1784 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主修数学，师从威廉·弗伦德 (William Frend, 1757—1841)。在校期间，马尔萨斯学习成绩优异，且在竞赛中多次获得奖励，1788 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被任命为萨里郡的一个牧师；1791 年又在剑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793 年当选为基督学院院士。1798 年，马尔萨斯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小册子——《人口原理》。1804 年 3 月，38 岁的马尔萨斯与他“漂亮的堂姐”哈里特·埃克瑟尔 (Harriet Eckersall) 结婚，并先后育有两女一子，其中一个女儿早年夭折，另一个女儿活到 1885 年，儿子于 1882 年去世但并未留下子嗣。婚后，马尔萨斯辞去了牧师一职，并于 1805 年接受了东印度学院的聘书，成为一名



教职人员，但依然被众多学者称为“马尔萨斯牧师”。1805—1834年，马尔萨斯一直担任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这是英国设立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他也被誉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1824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在欧洲享有非常高的声誉。1834年12月23日，马尔萨斯因心脏病去世，享年69岁。

马尔萨斯的一生，除了从事教学外，还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除了久负盛名的《人口原理》外，他在经济学领域也著作颇丰。1800年他出版了《当前粮食涨价原因的研究》(*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将粮食价格的上涨归因于“有效需求”的增加，而非货币数量的上涨。该小册子出版不久，他便受到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的接见。随后，他又相继出版和发表了《因惠特布雷德提出修改济贫法建议案给惠特布雷德的信》(*A Letter to Samuel Whitbread, Esq. M. P. on His Proposed Bill for the Amendment of the Poor Laws*, 1807)、《论纸币的贬值》(*Depreciation of Paper Currency*, 1811)、《谷物条例的后果以及谷物价格涨落对于农业和国家总财富的影响的考察》(*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s of the Corn Laws*, 1814)、《有关东印度学院的演说，用事实驳斥近年来在所有法庭上对它的指责》(*Statement Respecting the East-India College*, 1817)、《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0年初版，1836年再版)、《价值的尺度》(*The Measure of Value*, 1823)、《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1824)、《论供给条件》(*On the Measure of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to the Supply of Commodities*, 1829)、《论商品的价值》(*On the Meaning Which is Most Usually and Most Correctly Attached to the Term Value of a Commodity*, 1829)等论文及著作，奠定了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但使马尔萨斯饮誉世界的还是他于1798年匿名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在他生前，《人口原理》一共出过6版。第一版的完整书名为《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书的标题昭然揭示了马尔萨斯著书立说的目的。在书中，马尔萨



斯提出了迄今仍广为世人争论不休的著名论点，可概括为两个基本前提、两种增长方式、两种人口抑制模式和三个命题。在《人口原理》第一版问世后，马尔萨斯又花了5年的时间，游历德意志、瑞典、挪威、芬兰和俄国，收集相关资料，继续研究人口问题，为其人口理论增添了更丰富的经验材料。1803年，马尔萨斯用真名出版了《人口原理》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做了很大改进，从5万字左右的小册子发展为20万字左右的巨著，内容也更为充实，弥补了第一版“因琐事缠身而未能收集更多事实来阐明主旨”的遗憾。第二版的书名改为《论人口原理及其对人类幸福的过去和现在的考察，附预测将来关系消除和缓和由人口原理所产生的弊端研究》。随后，又分别于1806年出版了第三版，1807年出版了第四版，1816年出版了第五版，1826年出版了第六版，但6个版本中，除了第一版和第二版有较大差异外，其余各版相差无几，完全秉承了第一版的基本思想。我们所翻译的便是马尔萨斯于1798年出版的第一版《人口原理》。

二、《人口原理》写作的宏观背景

其实，人类很早就开始关注人口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从各自所处的社会背景、阶级立场出发，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不同的人口思想。

在史前时期，人口增长极其缓慢。据历史资料考证，公元前100万年世界人口为1万~2万，公元前1万年增加到400万，公元前3000年约为3000万。由此可见，在近100万年的时间里，世界人口仅增加了3000万左右。到了封建社会和中世纪时期，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口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且持续增长的时期。到公元元年，世界人口达到2.3亿，1650年增加到5.5亿。其间，尽管因战争、疫病的影响，以及社会背景的差异，学者们关于人口问题的看法存在明显差异，但鼓励人口增长的思想一直占据主流地位。

长期以来，人口和土地一直都是封建政权赖以生存、维持其统治的物质基础，二者是否协调，关系到社稷安危、国家治乱。由于战事紧张、灾害连

连，人口常常不能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需要，故历朝历代都在追求“人力田畴，二者适足”的状态，即人口众多以开发土地，土地肥沃充足以供养人口。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多少人才足够，则要从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一般都有不同的政策。人口和土地的适度关系，或者说人口与粮食的适度关系，一直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军事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一致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墨子（约公元前 468—公元前 376）、管子（约公元前 723—公元前 645）、商鞅（约公元前 395—公元前 338）等古代思想家均主张增殖人口。孔子的儒家思想、孝道文化是几千年来我国传宗接代思想观念特别浓厚的重要原因，对人口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战国初期，鲁国著名的思想家墨子在其《墨子·贵义》中指出，“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但若增加人口，同时发展生产，则可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使人民衣食足。为此，他提出早婚、非攻等一系列增加人口的具体措施。商鞅和管子等人则从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商君书·弱民》）、“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管子·重令》）。

虽然先秦时期，广土众民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但是仍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看到人口过快繁衍的弊端。到了战国末期，法家著名思想家韩非子（公元前 280—公元前 233）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而“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即人口众多导致人均财富减少，为了谋求生存资料可能引发战乱（《韩非子·五蠹》）。

到了清代，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人口发展迅速，人口过剩带来的问题逐渐显现。据《清实录》记载，1652 年，全国总人口为 1 448 万；康熙五十二年（1713），全国总人口为 2 358 万，61 年间增加了五分之三左右；乾隆六年（1741），全国总人口达到 14 341 万，短短二十几年，人口增长了数倍之多。在此背景下，洪亮吉（1746—1809）提出了人口过剩的思想，



被认为是和马尔萨斯一样在人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且其思想早于马尔萨斯。他认为“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洪北江全集·意言·治平篇》）。洪亮吉虽然并未使用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粮食以算术级数增长的表述，但同样表达了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思想。他认为人口过剩的原因同时包括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为此，洪亮吉提出了两种抑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一是针对自然因素，提出“天地调剂之法”（《洪北江全集·意言·治平篇》），即干旱、水患、疾病、瘟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增加人口死亡。二是针对社会原因，提出“君相调剂之法”（《洪北江全集·意言·治平篇》），即国家通过减税轻赋、赈济灾民等措施减少人口死亡。

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均提到控制人口和适度人口思想。他从军事防御和人口管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小国寡民”的城邦政策，认为公民的数量最好是维持在 5 040 人。为满足这一人口规模，他主张国家应干预人民的婚配，通过优秀男性与优秀女性结婚提高人口素质，通过移民和杀婴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秉承了柏拉图适度人口的思想，强调稳定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但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人口思想，主张增加人口。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主张人的生死由上帝支配，已婚人口不能人为采取措施进行避孕、任意终止妊娠或者离异。同理，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约 1225—1274）认为，生儿育女是人的自然本性，人们应遵循这一本性，反对采取避孕、节育等措施人为干预生育行为，鼓励人口增殖。

从 17 世纪 50 年代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资本主义兴起，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和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使得死亡率大幅下降，带来了世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由 1650 年的 5.5 亿，增加到 1700 年的 6.3 亿，



1750 年的 7.3 亿，1800 年更是达到 9 亿，一百多年间接近翻番。这一增长速度相对于马尔萨斯提出的每 25 年人口翻一番无疑是较慢的，但此时的人口规模已经远远超出马尔萨斯时期的数量。由此，认为人口过剩的学者增多，主张人口控制的学术思潮逐渐成为人口思想的主流。

以理查德·坎蒂隆 (Richard Cantillon, 1680—1734)、弗兰斯瓦·魁奈 (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 等人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坚持以自然秩序为看待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认为农业而非工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是社会收入的基础，土地所有者阶级才是社会的主宰，决定着其他社会阶级的生存与生活。但是，如果人口的增加不受任何抑制，就会像谷仓里的老鼠一样，无限繁殖，直至受到生产资料的限制。而以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 (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以及詹姆斯·德哈姆·斯图亚特 (James Denham Steuart, 1707—1780) 等人为代表的重商主义者则认为对外贸易才是增加国家财富的唯一手段。因适逢黑死病流行，人口大量减少，重商主义者鼓励人口增殖。他们认为，人口增加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提升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增加国民财富。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在他的著作中也谈到人口问题，其观点被马尔萨斯多次引用。他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国家财富积累，增加人均财富的占有量进而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但是，直到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才有了一部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著作，开启了人口理论的先河。因此，此书一出，便引起广泛争论，马尔萨斯也因此留名史册。

《人口原理》是时代的产物。马尔萨斯生活的时代正逢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经历了 17 世纪频繁的政治动乱和 17—18 世纪关于理性是神学和信仰还是自然科学的讨论。此时的英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转变：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业生产，棉纺织业取代了毛纺织业成为核心产业，与此相关联的采矿业、交通运输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工业成为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1700 年，英国三产的比重分别为 56 : 22 : 22，而到 1820 年三产之比则变为 37 : 33 : 30，农业的比重大幅下降。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土地贵族



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相应，欧洲人口也迅速增加，成为当时全世界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18.7 人，而同时期的亚洲每平方公里仅为 14 人，非洲和美洲更是不到 5 人。人口的大规模增加，一方面可以刺激生产，降低劳动力成本，加快工业革命的进程；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粮食危机、无业失业、工资下降、物价上涨、居住拥挤、生活贫困等社会问题，迫使众多不幸者以乞讨为生，或通过移居他乡寻找新的生活来源。

在此背景下，“人类究竟是从此刻会以加速度不断前进、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抑或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做出种种努力之后仍然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无限遥远”（《人口原理》）这一问题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其中，对马尔萨斯影响最大的是孔多塞和葛德文二人。在 1789 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改革论者马里·让·孔多塞（Marie Jean-Antoine Nicolas Condorcet, 1743—1794），完成了被称为世纪遗书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尽管在撰写此书期间，孔多塞先生已经被残酷地剥夺了公民权利，但他始终相信，人类社会在未来将趋于完善，现实的不平等和贫困都是由私有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他从社会进化的角度出发，推测人类有机体是可完善的。他认为，随着人类理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医疗技术水平将不断得到改善，人类虽然不能免于死亡，但人类的寿命可以无限延长，而且延长的限度大于任何已知的界限。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只会发生在遥远的未来，人口增长不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

1793 年，英国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出版《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简称《政治正义论》）。在书中，葛德文极力赞美法国革命，强调现有财产制度的不平等违背了正义的原则，导致了人类的贫困和罪恶，而所有的政府都在试图庇护这种不平等的、非正义的人类制度。因此，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分配公平的社会，就必须废除现有的私有制。他反对人口过剩的

论调，认为“也许人口增长了无数世纪以后，土地仍将足以供养生活于其上的居民”。即使性交基于完全自愿的原则，这种自由也并不会导致男女乱交，因为理性会引导人类精神的进步，防止纵欲过度，人口增长对平等制度的阻碍作用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发挥出来。

1797年，即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第一版出版的前一年，葛德文又出版了《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The Enquirer*，简称《研究者》）一书。他在该书的“贪婪与奢侈”（*Avarice and Profusion*）一章中指出，机器的发明与使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劳动力的供给数量远远大于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报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开销，劳动者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陷入贫困和痛苦的境地。在该书中，葛德文提倡建立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能够平等地分担劳动，平等地享有劳动成果。

葛德文的观点受到马尔萨斯父亲的热烈追捧。当时，老马尔萨斯兴致勃勃地把葛德文的名著《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介绍给他，但父子俩对此书的理解不一，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马尔萨斯看来，葛德文的观点过于理想化，跟现实的社会发展水平不符，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不相衬。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粮食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粮食增长，理想社会和完全平等是无法达到的。在与父亲辩论之时，马尔萨斯“最初想出了他的理论”，“下决心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予以出版”。于是，他在1798年匿名出版了《人口原理》的第一版，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三、本书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由书名可以看出，《人口原理》是一本论战性的著作，马尔萨斯试图通过构建人口理论对孔多塞和葛德文的改革思想予以驳斥。《人口原理》第一版共有19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和二章，是该书的主体部分，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原理的两个基本前提和三个命题。第二部分为第三至七章，是人口原理的论证部分，马尔萨斯通过描述野蛮或狩猎状态、游牧状态以及文明国家状态的人口历史来证明其理论，并以当时的英国为例分析了人口理论中三个命题的合理性。第三部分是第八至十七章，是该书的辩论

部分，马尔萨斯批判了以葛德文和孔多塞为主的大批学者的观点，并强化了人口原理的应用性。第四部分为第十八和十九章，是总结部分，概括和重述了他对人类和社会可完善性的看法，他承认自己“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具有忧郁色彩，那是因为我确信现实世界中本就存在这样的色彩，而非因我的偏见或我生性忧郁”。

如书名所示，《人口原理》旨在分析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论证“人类和社会的不可完善性”。马尔萨斯从人口原理出发，回顾了野蛮状态、狩猎状态和文明国家状态下，英国以及世界范围内，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情况，力图证明人口原理的存在，反驳孔多塞、葛德文关于人类和社会可完善性的论断。

在本书第一部分，马尔萨斯就抛出了自己的主要观点，提出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照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增长必然会超过生活资料的的增长；贫困、罪恶、战争、自然灾害等积极性抑制，以及推迟结婚、不婚等预防性抑制，将会迫使人口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的增长相互适应。

在论证主要观点之前，马尔萨斯“合理”地提出了两条公理，这也是他整个论证的基本前提。第一条公理是，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目前而言，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点，没有人可以不依靠食物而生存。第二条公理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将几乎保持现状。即使有如葛德文先生一样的学者曾推测，两性间的情欲有一天终将消失，也有已经步入晚年的老人批判逐渐消失的情欲，但在马尔萨斯看来，这些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情欲一直存在。因此，如果就此推测情欲终将消失，那就如同将例外变成规则，是不符合哲学规范的。

假设情欲持续存在且对人口增长不加抑制，则人口将按照 1、2、4、8、16、32、64 这样的比率增长，以美国为例，人口每 25 年就会翻一番。但显然，这一增长率并未达到人口的最高增殖力。如果一个国家人人平等，道德高尚，民风淳朴，生活资料充足，人们无须为家用不足而担心，无须为抚养子女而忧愁，则该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会大大超过我们迄今所知的任何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



与人口增长情况不同，即使假定通过实施尽可能好的政策，开垦更多的土地，大规模地鼓励农业生产，最为乐观的假设也只能是，该国的产量在第一个 25 年里翻一番，但在第二个 25 年里就不可能假设产量会增长到原来的 4 倍。根据对土壤肥力和生产条件的判断，在第二个 25 年里，粮食产量最多增加与原产量相等的产量，即假设生活资料按照 1、2、3、4、5、6 这样的比例增加。

由于人口的增殖力和土地的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而食物又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所以，注定有人会遭受贫困和痛苦。假设某一国家有 700 万人口，且现有粮食产量刚好能养活这些人。在第一个 25 年里，人口的增长和食物的增长刚好相等，生活资料依旧能够满足所有人的生存需要，但从第二个 25 年开始，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得不到足够的生活资料。

为了使人口和食物增长始终保持一致，社会自我完善过程中必然存在不可克服的巨大障碍，只有依靠强有力的自然法则不断发挥作用，才能抑制更加强大的人口增殖力。相较于植物和动物，人类对繁殖力的抑制较为复杂。人类是既包括肉体也包括理性的复合生物，一方面受到强有力的本能驱使而繁衍后代，另一方面又受到理性的束缚，通过对未来的考量做出适宜的生育或婚姻决策。

根据上述推论，马尔萨斯总结出了三个“一目了然”的命题。首先，若无生活资料，人口便无法增长。很显然，这实际上等价于第一条公理。其次，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长。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两条公理的结合，生活资料只能满足人口的生存，不一定带来人口增长，但如果情欲一直持续，永不消失，则只要有足够的生活资料，人们不仅能够存活而且会生儿育女。基于前两个命题，马尔萨斯提出的第三个命题便是，若无贫困和罪恶，占优势地位的人口的增殖力便不会受到抑制。

接着，为了更加充分地证实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马尔萨斯考察了人类迄今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在原始社会，狩猎是主要的职业，也是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由于



生活资料分布零散，因此总体而言，人口也相应稀少。但若将范围缩小到某一地区则会发现，任何定居在土壤肥沃之地的居民，尽管一个家庭可能很少有超过1个或2个孩子能长大成人，但其人口增殖力依然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而且这种状况一旦发生便会持续下去。最后，食物的缺乏将狩猎民族的人口限定在稀少的水平上，除了一些局部和暂时的情况以外，所有野蛮民族都会感受到这种抑制。

虽然对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了解甚少，但马尔萨斯坚信，游牧民族也难免因生活资料匮乏而致贫的命运。与现代人不同的是，游牧民族的人不会担心未来的生活，也不会抑制人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他们普遍希望通过迁徙和与之伴随的掠夺来改善物质匮乏的处境；贫困时，他们甚至可以将子女卖身为奴。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状况的不平等很快就会出现，而且贫困必然会最沉重地落在最为不幸的、最脆弱的社会成员身上，其中，妇女最能体会到这种困难。

到了马尔萨斯生活的年代，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于畜牧和农耕混合的状态，英国作为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为他撰写《人口原理》提供了非常恰当的例子，用马尔萨斯的原话来说就是，“对它的考察，只需稍加修改，便可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

结合英国的情况，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抑制的两种主要方式，即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性抑制。

所谓预防性抑制，或称道德性抑制，是指对养家糊口的忧虑。预防性抑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影响着英国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便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一想到成家后就必须节俭度日，必须放弃自己喜爱的快乐生活，便打消了结婚的念头。当然，这种担忧对上等社会阶层人士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社会阶层越低下，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就越强烈。因受制于这种黯淡的生活前景，英国很多下等社会阶层人士选择过独身生活。对婚姻的限制会产生十分明显的不良后果，使两性陷入无法摆脱的不幸之中。

所谓积极性抑制，是指已经开始增长的人口受到的抑制，是下等社会阶层人士实际面临的苦难，这些苦难使得他们无法给予子女应有的食物和照料。



马尔萨斯认为，要消除下等社会阶层的贫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且根据人性的固有法则，要使他们完全摆脱食物匮乏的压力是绝对不可能的。英国的情况表明，被寄予厚望的《济贫法》也未能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虽然补贴可以增加穷人的收入，让他们因可获得教区救济而结婚生子，但供养他们的粮食产量却并没有相应增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济贫法》在生产它所救济的穷人。

在马尔萨斯看来，所有这些抑制因素都可以归结为贫困和罪恶两大类，但土地和食物的匮乏所带来的贫困——对人口增长的抑制作用远比战争、瘟疫、饥荒等罪恶因素大得多。因为即便是古老的国家也可以从战争、瘟疫、饥荒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过来。

从第八章起，马尔萨斯开始了与孔多塞、葛德文等人的论战。首先，马尔萨斯针对孔多塞关于人类精神进步的概述，否定了人口增长引起的困难是遥不可及的观点。马尔萨斯和孔多塞都认为，如果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那么，其必然结果要么是幸福和人口持续减少，要么至少是在善恶之间摆动。不同的是，孔多塞认为，虽然这种摆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到来的时期还很遥远。而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过剩的时期早已到来，而且导致这种摆动持续存在的原因，自从人类出现以来就已存在，除非人类的本性发生变化，否则还将永远存在。

紧接着，马尔萨斯利用动物繁殖和植物栽培的例子，反驳了孔多塞关于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与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的推测。马尔萨斯认为孔多塞混淆了界限不能确定的局部改善和没有界限的进步，是在用界限不能划定的、局部的改善推论人类进步是无限的，其推理过程完全违背了哲学规范。

接下来，马尔萨斯将矛头指向葛德文，并用了6章的篇幅来反驳葛德文的观点。在第十章，马尔萨斯讨论了葛德文的平等制度，认为他将人类的一切罪恶归结于人类制度是错误的。马尔萨斯采用欲抑先扬的方式，首先毫不吝啬地赞美葛德文所提出的平等制度是迄今为止最为美好和令人向往的制度，并假设葛德文的平等制度可以实现，然后分析即便是在如此完美的社会形态下，人口原理所带来的贫困和罪恶也终将会压在人们身上。



在第十一章，马尔萨斯讨论了两性之间的情欲，否定了葛德文关于两性之间的情欲在未来将会消失的论断。实际上，马尔萨斯在本书的第一章就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将几乎保持现状，并把这一推测作为其论证的重要前提之一。

第十二章中讨论的观点实际上与前面驳斥孔多塞的观点雷同，但却采用了不同的论据和论证方式。马尔萨斯认为，根据人类可观察范围之内的恒久不变的自然法则，以及过去类似事件的预示，无法推测出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的结论。

在接下来的一章，马尔萨斯批判了葛德文把人类当作纯粹理性的动物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是一种复合生物，同时具有理性和肉体，而且情欲总是会干扰人类理智做出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惩罚无疑可以起到约束和警示的作用，通过把那些具有不良习惯而对社会有害的社会成员监禁起来，通过表达社会对某种罪行的看法，通过更加明显地把罪行与惩罚联系起来，可以维持一种道德动机以劝阻他人不要犯罪。

在接下来的两章，马尔萨斯对葛德文的论证过程以及在“贪婪与奢侈”一章中所提出的建议进行了反驳。葛德文的五个命题分别是：“正确的推理和真理，若能被充分地传达，则必将战胜谬误；正确的推理和真理是能够被充分地传达的；真理是无所不能的；人类的罪恶和道德上的弱点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人是可以完善的，换言之，人是可以不断改善的。”

在马尔萨斯看来，虽然葛德文关于政治真理的五个命题是其《政治正义论》一书的核心，但这五个命题都是不成立的。他认为，葛德文提出的前三个命题可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三段论，但彼此之间却相互矛盾，且均不能成立；第四个命题实质上相当于前一个命题，只是叙述方式略有不同而已，因此必然也就和前一个命题一样不能成立；第五个命题则是前四个命题的一般推论，既然其基础已坍塌，它也就不可能成立了。

葛德文认为人类的一切罪恶皆源于当前的社会制度，因此，要改变穷人的生活状况，就必须废除财产制度、婚姻制度等引致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建立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但马尔萨斯认为，虽然葛德文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

十分美好，却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且，如果以葛德文的平等制度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引领，则人民可能将处于更加痛苦和不幸的境地。

最后一部分是马尔萨斯对其观点的重申，他花了两章的篇幅完整论述了“人类的不可完善性”。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马尔萨斯在书中引用了大量中国的事实，在他眼里，中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国家，但同时也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它的每一亩土地都已被精耕细作了很长时间，土地的生产力很难有较大增长；而且，早婚的盛行会导致百姓更加贫困，饥荒、战争等一系列积极性抑制成为控制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方式。

四、学界评价

1798年《人口原理》的问世，顿使马尔萨斯名扬天下，也为他带来了至今200多年的争议。他拥有达尔文、小威廉·皮特、普赖斯在内的众多追随者，也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批判。有人说他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典范，也有人说他是庸俗经济学的代表。英国研究马尔萨斯的著名专家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 1852—1941）在其《马尔萨斯及其著作》（*Malthus and His Works*）一书中写道：“马尔萨斯留下了无数人阅读而万人痛骂的著作”。不管评价如何，马尔萨斯终究以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被载入史册。

在马尔萨斯以前，人口增加被普遍认为可以增加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然而，马尔萨斯却认为，虽然人口增加可以促进总产量的增加，但它却更趋于减少人均产量，降低人民的幸福感。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政治观点迎合了当时的封建土地贵族，受到众多政治家、经济学家的追捧。他最知名的一个门徒是英国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1601年，为缓解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英国颁布了《济贫法》，以教区为单位向没有工作能力的老弱病残者或孤儿提供援助；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则要求其通过做工获得生活资料。1796年，皮特决定修订《济贫法》，为多子女家庭增加援助——因为他认为，人口增长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加。他将社会成员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自己劳动挣得生活资料，另一类则通过增加人口使国家富足，对于后者，他们可以要求获得国家的救济。但《人口原理》问世以后，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想法，并解释说是为了向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表示尊重。